

# 翻译、治学与创作

——邝健行教授访谈录

董就雄

邝健行先生，祖籍广东台山，1937年生于香港。1962年毕业于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书院）。1963年赴希腊，入雅典大学。1971年获雅典大学哲学博士。随后返港，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1995年转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2002年退休，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及新亚研究所教授、图书馆馆长至今。邝健行先生学术活动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希腊古籍的中文翻译；二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集中在唐代杜甫和律赋的探论；三是韩国朝鲜时期诗话以及中朝诗歌交流的研究。先生工古典诗歌，退休以后，学术研究之余，组织诗社，提倡风雅，指引后辈。其著作略举数种：《柏拉图三书》、《追思录》（以上翻译）、《诗赋与律调》、《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杜甫新议集》（以上论文集）、《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朝鲜人著作两种：干净衙笔谈、清脾录》（以上编著及点校）、《光希晚拾稿》（诗文集）。本刊特委托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一级导师董就雄博士就相关学术问题采访邝健行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 遂乘霄汉翼，直下海西湄<sup>①</sup>

### ——希腊游学与希腊古籍中文翻译

董就雄 邝先生，十分高兴能访问您，这对我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访谈就从这里开始。您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却有一段不要说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是其他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没有的人生经历。那就是：您在希腊学习了十年，获得了希腊雅典大学哲学博士。可是您回香港后一直在大学中文系教书，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在外国十年所学，好像还不曾

作充分发挥，未免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很想听听您的说法。

邝健行 你说我是知名学者，那是不敢当的。我只是一名追随风气之末，也做一点研究工作的人而已。谈到希腊，我无疑在那儿学习过，可是没有十年。我1963年9月由香港乘飞机到雅典，1971年秋冬间离开雅典，前后八年多一点。离开希腊，到美国作过短暂居留，1972年春夏间返香港，跟着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教书，2002年秋天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退休。

由最初入大学工作到现在，转眼间过了四十年。有时回顾，确实泛起过丝丝惋惜和惆怅。我是广

东台山人,华侨世家,新亚书院大学本科毕业时,父母亲都在美国。毕业后想法子到美国升学,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也不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可是我选择希腊求学,心底真是带点想头。说是想头,其实也不算什么了不起。我不是想大大发扬希腊学,建立一代风气,我只想切切实实做点翻译希腊古籍的工作,由希腊文到中文,给日后中国的希腊研究提供若干方便。我那时注意到希腊典籍翻译成中文的,数量不多,其中不少还是从另一种译文(如英文、法文)转译过来,所以希中翻译工作的开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这样的“想头”,很得到教过我“诗选”和“杜甫诗”的曾履川(克崙)先生认同。出发之前,曾先生特地写了一篇《送邝健行游学希腊序》相赠,文章后来收进曾先生的《颂橘庐文存》中。先生在文中拿义净、玄奘相勉。我虽然不敢比拟古人,但是区区心意,毕竟存于方寸之间。可是四十年过去了,我做了什么?期间虽然也译了几种书,可是远远配不上读了八年书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我既辜负了曾先生的期待和勉励,也自感惭愧。

四十年来,由于在中文系教学,接触中文典籍,自己是做了一些古典文学的研究。可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两岸三地无数,哪一个范围学术界没有人接触探讨?我参与不参与,无关整体大局。然而希腊典籍的中译,从事者实在不多,有人参与,哪怕是一个像我这样水平不高的人参与,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我相对地放弃希腊部分,转向中国,更不容易做出成绩来,更不容易谈得上有什么贡献。然而时光不再倒流,年岁已大,有时只能惋惜无已了。

董就雄 您孜孜不倦探研中国古典文学的原因,有没有曾经想过?

邝健行 我再三反思,个人把大部分精力投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固然由于客观环境使然。香港的大学没有专授西方古典的学系,我回来香港,只有加入中文系。既然在中文系工作,不免要写点有关中文的研究报告。说是应付考核的要求也好,说是表示在系中的教研成果也好,写文章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原因,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指出:个人的积习、早年种下对古典文学的癖好,同样让我对此“板块”放不了手。一入其中探索,便觉醺醺有味,于是便被占去不少时间。

董就雄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译作吗?

邝健行 可以的。至目前为止,我出版过四种古籍中译: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辩词》(*Apology of Socrates*)、《克里顿》(*Crito*)、《波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克舍挪方的《追思录》(*Xenophon: Memorabilia*)。前三种以《柏拉图三书》为总名,由香港学津书店1983年出版;后一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后来中文大学又把版权转让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在台湾印刷发行。

董就雄 四种书的内容大概怎样?

邝健行 《苏格拉底辩词》记录了苏格拉底被三名雅典人控告,在法庭上的几次申辩发言。《克里顿》记载了苏格拉底被判罪成,在问死前两天与前来探监的老朋友克里顿的对话。《波罗塔哥拉》记录了苏格拉底在一名雅典富豪家中,跟当时赫赫有名的智士(Sophist)波罗塔哥拉和别的智士的讨论过程。《追思录》作者早年跟苏格拉底有接触,对苏格拉底敬服。苏格拉底死后,凭借记忆、他人的转述以及若干传闻,写成一册以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和品性为主的作品。柏拉图的三种作品,我开译时已有中文译本,不过当时觉得还是可以从希腊原文重译。经典作品本来就可以有多种译本并存的,柏拉图作品的英译便有多家。我国古代介绍佛经,也是不避重译。至于《追思录》,就个人所知,前此没有中国学者翻译过。

董就雄 您退休以后写过一首诗,颔联是:“晚景未参无住诵,远文愿出有生年。”从“远文”句看,您好像计划再搞翻译,是这样吗?

邝健行 你看诗倒是仔细,不错,那首诗好像是2006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开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写给会长傅璇琮先生的。意思是说自己年纪大了,此后再也不能参加这类研讨会了,希望余下的时光,做点翻译工作打发。

董就雄 您的翻译计划进行得怎样?

邝健行 也不是什么大计划,只是想将克舍挪方其他三种以苏格拉底为主的书籍译完,好完成一个系列罢了。他这三种书是:《苏格拉底辩词》(*Apology of Socrates*)、《会饮篇》(*Symposium*)和《治家篇》(*Oeconomicus*)。这三种目下已基本译完,需要稍作润色,并加入必要的注释。

董就雄 您为什么选克舍挪方这四种书翻译？

邝健行 克舍挪方著作等身，我所以只选《追思录》等四种翻译，一则因为这四部书一向未有中译本，值得介绍。再则这四种书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尽可以拿来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比研究。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著述，后人对这位贤哲的认识，主要凭借柏拉图的作品，其次是克舍挪方的作品。然而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才性以及学问思想不同，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随之而异。柏拉图才气纵横、思力深邃，学术界一致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超群迈众，渊博睿智，那是在柏拉图的才情推动下，混合了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柏拉图本人哲学观点的人物，所以整体形象伟大而光辉。至于克舍挪方，才气远比不上柏拉图，创造力和思辨力也差些，于是在其笔下，苏格拉底更像一位平实可接近的道德教师。凡作讨论，比较偏于生活日用上的问题，不作高深的哲学上抽象思索。总的说来，苏格拉底的形象未免平凡，不像人们心目中哲人的样子。尽管我们讲苏格拉底，基本上都从柏拉图的著作出发，然而克舍挪方既有不同角度的描述，对研究者毕竟提供了有用的参校资料。其实已有学者指出，以克舍挪方的才气思力，要他把书中人物脱胎换骨，另呈新面目，恐怕不容易办到。那么，他书中苏格拉底的“历史性真实”程度，也许要比柏拉图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更为贴近可靠也不一定。

董就雄 说到克舍挪方，我注意到大陆通行译作色诺芬。您译本中的专有名词音译，是不是跟大陆的通行译法有时不同？

邝健行 有意思的问题。简单的答复是：不错，我译本中不少专有名词音译，跟大陆目前流行的译法不同。

希腊文中的专名，像人名或地名之类，开始介绍过来时没有统一的译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译者逐渐有共识，然后有人编人名词典之类，译名逐步统一起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译《柏拉图三书》时，海内外讯息交流不密，我还不知道大陆中文译名的统一情况，所以自行译出了。《追思录》同样沿着《柏拉图三书》的译法。我的原则是（一）依据现代希腊语音译，像克舍挪方就是例子。名字第一个

拉丁字母为“X”，现代希腊语发音“ks”，所以“Xenophon”的“xe”，便音译为“克舍”了。（二）已经习用的专名，即使不大符合现代希腊语发音，保留不变，像柏拉图就是。柏拉图一名，用拉丁字母照希腊字母转写，应该是“Platon”，中文的音译为“柏拉顿”才对，但学术界从英文“Plato”转音为柏拉图为时已久，而且流行公认，便不作改动。（三）专名中最末一个字母“s”音，本应音译为“斯”，有时删去，像波罗塔哥拉就是例子。全译应作“波罗塔哥拉斯”，拉丁字母原来写成“Protagoras”的，“s”（斯）音在中文中给删掉了。这是仿照“Socrates”作苏格拉底而不作苏格拉底斯的做法。译名的使用，讲的是约定俗成，讲的是流行公认。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便不妨跟随，不一定强辩谁对谁错。我想有一天《柏拉图三书》或《追思录》在大陆出版，书中的专名中文译法恐怕要改动从众为是，最多附一个和我本来译法的对照表。

董就雄 译事讲求信达雅。可是译家在实际下笔时，应该有一些轻重取舍的分别。我们见到有些人主张直译，有些人主张意译，有些人宁信不雅，有些人宁雅弃达，种种方式不一而足，您在译书时怎样斟酌其间？

邝健行 译家译出来的文字，要不背离原文的意思，要能够把原文的意思表达明白，另外有可读性，这原是翻译应有之义。话虽如此，要把三者做得完满，实在不容易。这主要由于原文和译文所从出的语言，在结构方面，在表达方式方面，以至凭藉两种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化传统方面，往往有极大区别，要把一方在各个层面上完整而不变样貌转为另一方，几乎没有可能。希腊文和中文就是这样。我不曾深究过翻译学理论，翻译时只是私下定了几条准则，极力要求遵守不背离。（一）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意思（二）注意照顾原文的表现特色（三）译文文字尽量符合汉语语法和中文行文方式，让读者看懂（四）明畅而有可读性（五）第四点应在前面一二三点完成的基础上面延展。很多时候我拿佛经开头“如是我闻”四字跟朋友同学讲。这四字最标准的汉语写法，应该是“我闻如是”。可见像“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干”之类受语置前的话，汉语也可以说的，所以“如是我闻”仍合中文行文方式。我们看梵文本：“EVAM MAYĀ ŚRUTAM”词序是“如是”、



“我”、“闻”。古代翻译家这样译法,既不背离原意,又能照顾两种文字的特点和可读性。

举一个希腊文翻译例子,亚理斯多德《诗学》第一章开始时,亚氏在概说全书将要谈论什么问题之后,接着说:“根据自然,从前头中最先一点开始。”(直译)这两句的意思,用正常语言表达,就是:“我们会根据自然顺序,从最先最先一点开始。”《诗学》中文译本,起码有七八种,各家译法不同,试举两家谈谈:(一)“现在就依自然的顺序,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罗念生译)(二)“让我们依照自然的次序,从头开始。”(胡耀恒译)。细看两则译文,罗译的“原理”,原文没有,译文看来想把隐藏的意思揭出,但毕竟不尽合原意。胡译“从头”,似乎接近原意了,但原文中“最先最先”的强调之意,胡译未能显出。个人以为,原文两句倘使译成“依照自然次序,从前头中最先一点开始”,也许算是较合信雅达的要求,虽然原文隐含“次序”之意,汉译要明白写出,才能成句。另外,拙译《苏格拉底辩词》开始时有这样一句:“话说得这般动人!”句子应该说明畅可读。不过最近我再看希腊原文,准确的意思是“话说得这么有说服力”,后面一句似乎不及前面一句的简洁明畅。前句尽管基本上清楚表达了原文的含意,可不是原文的表达方式。将来有机会改版时,要把后句改代前句才是。

董就雄 您去希腊求学的原因,上面提过一些,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另外,八年留学生活的感觉怎样?能不能向我们谈一些?

邝健行 新亚书院求学期间,经常听到钱宾四、唐君毅等老师谈中西文化交流,觉得很有意思,很有道理;再加上看了几本跟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书,像慧皎的《高僧传》,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类;不期然兴起到外面求学的心意。当时这么想念了中文系,算是接触到一点中国文化了,要接触西洋文化,不如到它的根源地走走。就是这样子决定去希腊。其间实不曾作过思前想后通盘计算。一点理想、一点冲动,便决定了行程。

八年希腊生活,很值得记忆,很值得怀念。书虽然念得不怎样好,可是历览希腊山川、接触希腊人民、结交希腊朋友、读希腊古今书籍,日子过得很愉快。其他人在文章中有时提到的留学生苦况,我基

本上是没有的。2009年朱少璋君编成《曼殊外集》,交学苑出版社出版,我给他的书写序,其中有这么几句:“拜伦所哀的国土,正是我上世纪60年代度过将近十年美好时光的所在。诗中提及的摩罗东(即今马拉松)和迦逻(即今色拉美),我几番经过,怅惘生情。诗中提及女诗人奢浮(今译萨福)的篇章和三百斯巴族(今译斯巴达人)死守披丽谷(今译德摩比利)的史实,我诵读载籍,或悠然神往,或低徊悲慨。”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回港不久,1975年便译成《希腊短篇小说集》出版。我不是抱着什么介绍希腊近代文学作品的用心,而只是为了纪念刚过去不久的留学生活,《前言》开始这么写:“离开希腊整整三年了。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度过了一段悠长的但是值得回味的时光。我到过相当多地方,听过不少故事,也接触过好些人物;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习尚传说,依然常常在我脑间浮现记起。我不否认,对于希腊,我有着至厚的温情、至深的怀念。也就是在这种温情和怀念的推动下,我才译成这本书。”我不必隐瞒,这段文字是我真实的表白。

## 神女汉皋仍绰约,我来幽谷访明珰<sup>②</sup>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董就雄 您的古典文学研究比较着力在哪些方面?

邝健行 也说不上在哪方面,如果一定要说,写关于杜甫诗和律赋的文章多些,关于八股文也写了几篇。

董就雄 您写有关杜甫的文章最多,我约略统计,怕有十几二十篇。研究杜甫的人很多,您觉得还有探索空间?

邝健行 杜甫研究是显学,专门学者无数。硬是走进去谈问题,容易吃力不讨好。我本无意写杜甫的文章,只是几十年来,许多时候系里指派开“杜甫诗”一科。为了教学,不能不多看些杜甫作品,也不能不把古今谈杜甫的资料找来参考。久而久之,在阅读原来作品和各种参考资料之余,也会产生一点点个人的看法。也不知看法对不对,须写成文字发表,好向高明请教。

董就雄 我了解您研究杜甫是有集中点的,能

概括一下是哪几方面吗？

邝健行 可以的，勉强说来，算是比较集中谈杜诗吴体、杜甫考试和李白杜甫初次相遇时间三个问题。

董就雄 我知道您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新意，甚至可以说推翻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请您先谈谈杜诗吴体问题。

邝健行 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吴体源于民歌说新议》发表。主要表达了我对郭绍虞先生认为吴体与吴地民歌有关这一说法的怀疑。郭先生是著名前辈学者，他的说法的影响力自然很大。郭先生说“吴体是民歌体的拗体”，“是拗体中不用古调而又接近民歌风格之拗体”。杜甫是把自己的《愁》诗看成吴体的，郭先生说《愁》诗具备了下列特点：七律、拗体，跟民间诗体特别是吴地民歌的音节接近。我在拙文中对郭先生的论证，表示了个人的看法。总的说来：吴体似乎不源于吴歌。那么，以《愁》诗为代表的吴体在体式和音节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表面看来，《愁》诗和后来晚唐和宋代作家写的吴体诗都是平仄不谐的七律，也可说是拗体。于是我便把注意力放在拗体和唐宋人写的吴体的音节比对上，写成《论吴体和拗体的贴合程度》一文发表。总的结论是：吴体和拗体在声音形式和上下句黏合的层面上，贴合程度很大，甚至看不出有疏隔的情形。表面看来，说吴体即拗体，实在并不为过。可是，杜甫为什么把《愁》诗称作“吴体”，而不是“蜀体”或“鲁体”等等呢？我始终对这一问题思考着。郭绍虞先生让吴歌牵涉，无疑对吴体一名的由来作出了说明的，只是郭先生的吴地民歌说未能完全说服我罢了。我后来又参考了一些资料，觉得唐代已经存在的“齐梁体”名称及格式可以拿来说明吴体一名的由来。清人冯浩指出齐梁体为变古入律之渐，有律句，有古句，一章中上下不相黏缀。这样的特点，也就是吴体的基本特点，而齐梁体流行之地在江左，即在吴地。我于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又写成《吴体与齐梁体》一文发表。

董就雄 近十年来，学界讨论吴体的文章好像不少。

邝健行 这表示，吴体仍有讨论的空间。学术讨论的过程，一般是愈来愈深邃精密，最后达至定

论或更趋向定论的地步。我阅览了一些近年的论文，对我早期提出的意见，有认同的，有不同意的，有补正的，我对各种批评意见都虚心聆听，细意反思。不过也想提出一点希望：譬如说，有些学者对我把吴体及齐梁体一起讨论，试图探索其中的共同关系，不表同意。从学术争鸣的角度而言，绝对可以和应该。不过我写《吴体与齐梁体》一文，用意在探索“吴”字的根源。不同意拙文的人，在“破”之余，如果能“立”——即说明吴体所以名为“吴体”之故，另标实质性的新意，那会更为完满。

董就雄 请您再谈谈杜甫考试的问题。

邝健行 这个问题是从玄宗开元年间，杜甫在洛阳福唐观考进士试引发的。具体情况这样：闻一多先生写过《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一文，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条下，引了一条前此好像未曾被人引用过、出自《太平广记》的资料，证明是年朝廷在洛阳福唐观考进士试。杜甫是年在福唐观应考，然而不第。闻谱引证好像确凿，于是广为学术界肯定。我详阅《太平广记》所引资料，再配合其他史料核对，发觉开元二十三年在洛阳福唐观的考试绝不可能为吏部试，充其量只能是河南府府试，便写了《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的文章。文章的主要论点大概这样：（一）《太平广记》文字记崔圆应制科后在试场拜武职，同时又在试场中考进士，同一年内无论如何办不到。（二）《太平广记》明言崔言“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既云“河南府”，则考试应属府试。（三）唐代进士试试场，通常都在皇城政府机关所在之处。福唐观远离皇城，与常制不合。这样说，福唐观既不是进士试考场，则杜甫在这里考试云云，自然谈不上。再说杜甫考进士试的年份，固然不少人主张在开元二十三年，其实定在开元二十四年（736）更为合适，我在稍后发表的论文《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视、论析和推断》中论证过。

董就雄 您能否稍稍谈一下具体的论证？

邝健行 我从史料记载和对杜诗文意体会两者切入。据史料，开元二十三年的知贡举为孙逖。孙逖文才出众，知人善鉴，甚负时誉。开元二十四年知贡举为李昂。李昂为人，性刚急，不容物。考试之前，已与到京待考的士子有过冲突。杜甫考不中进士，如果在开元二十三年考，便是在孙逖手中下第，如

果在开元二十四年考,便是在李昂手中下第。这是史料中的事实。我们再看杜甫在作品中自述。《壮游》:“忤下考功第。”“忤下考功第”的“忤”字,有“不合其意”之义。如果说自己考卷不合差劲的考官之意,因此考不中,这是给自己申辩开脱,还能自高身价。如果说自己的考卷不合高明考官的心意,最终考不上,则不免益发显示自己的不行。杜甫如果开元二十三年考试,追记这回事时,说给高明的孙逖贬退了,这对自己有什么光彩?杜甫后来投诗给鲜于仲通,希望鲜于仲通援引,也提过自己考试不第事,所谓“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郢先”。可是如果鲜于仲通读到他自己述考试失败的句子,想起杜甫是在“精核进士”的孙逖手中被斥退的,那么这个人还算什么俊才可以提拔?只有杜甫在诗中提到的考官是个差劲的人,像李昂那样,那么越说自己对考官不买账,考试结果越倒霉,自己的声价才越高。如此配合推论,我产生这样的意见:杜甫在开元二十四年考进士试的可能性远大于开元二十三年。

董就雄 有关杜甫考试问题,您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邝健行 学术界多用闻一多先生的说法,杜甫在洛阳应进士试。其实杜甫在洛阳应试,清人也有这样说的,像浦起龙就是。我如果对此有所不同,那是倾向清人朱鹤龄的说法:杜甫在长安应进士试。因为定杜甫在长安考试,《壮游》中“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的“京尹”一词,才好解释,京尹即京兆尹,简称京兆一名,是专指长安而言的。

董就雄 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初会时间,您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邝健行 李、杜两人初次会面时间,有两种主要见解。一是目前流行的见解:为天宝三四载间(744—745),一是宋人说法,为开元二十五年(737)。宋人黄鹤在《杜工部诗年谱》即持开元二十五年说。到了明末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〇《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后《笺》曰改作天宝三四载,其说似乎有据,遂成今天的主流说法。我对李、杜初会年份,别无新意,只是倾向支持宋人旧说罢了。

董就雄 为什么有这样的倾向?

邝健行 我读了杜甫《壮游》、《昔游》、《遣怀》、《赠高式颜》和《赠李白》(二年客东都)等诗,仔细揣

摩文字,分析诗意,觉得杜甫和李白、高适的初次交往,如果定在开元二十五六年间,诗中文字比较容易说得通。试举一例说说。《昔游》末尾处云:“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据仇兆鳌注,这四句写杜甫后来想起和高、李等人“晚登单父台”的感慨。诗中“青岁”与“不及”两句,反映了杜甫登单父台时正值“青岁”、“少年”的日子。“青岁”,仇注曰:“犹云青年也。”一个人说自己“青岁”或“少年”,应该指三十岁以下。诗中用此二词,可见杜甫和高适、李白初次同游时,不过二十来岁。可见如果说李、杜要等到天宝三四载才相遇,杜甫此时已年过三十了,配合不了诗句。拙文《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和《〈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运意与作年详议》主要想证明李、杜两人只在开元年间而不是在天宝初相遇。

李、杜天宝初年初相会说源于清钱谦益《钱笺杜诗》,我不久前把“钱笺”仔细梳理一下,发觉议论好些处未见周详,不无可议,因此“钱笺”的结论是否可靠,仍得斟酌。

董就雄 为什么仍得斟酌?

邝健行 试举一点:“钱笺”说李、杜二人天宝三载三月后在洛阳相会。寻绎文意,似指五月到八月一段时间。那么杜甫这段时间内活动怎样?事有凑巧,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有详尽记载,过程如下:天宝三载五月五日,卢太君在陈留私第病逝;同年八月十一日,灵柩启程运偃师;同年八月三十日在偃师下葬。可以推想,从五月到八月,杜甫或在陈留、或在偃师,跟家中人办理继祖母卢氏丧事,而丧事前后一段时间,譬如说四月和九月,杜甫应该仍留在家中。陈留和偃师,根据史书,一距洛阳四百里,一距洛阳七十里。就是说四月至九月这段时间,杜甫不在洛阳活动,遇见李白的机会相对地降低。再说是年九月以后,杜甫有孝服在身,绝不能过着像“钱笺”所说初见李白时的“醉舞梁园夜”的生活,这就是“钱笺”议论欠周详之处。我把类似的意见集中一下,也写成文章发表了。

董就雄 您的文章涉及关于杜甫生平几个重大问题的重新审视,不晓得学术界的反响怎样?

邝健行 暂时没有见到。

董就雄 邝先生,听您讲来,我忽生奇想。您论



李、杜初遇时间的过程,好比打仗。首先攻打对方外围据点,这等于分析杜诗句文意以及有关的资料,证明拿天宝初两人初会的见解去讲问题,不容易说得通。然后再挥军直攻主帅的堡垒,议论最初提出两人天宝初相会的“钱笺”,指出其未周之处,从而终结了这一问题。

邝健行 拿打仗来比拟学术研究,亏你有此“奇想”。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直攻主帅堡垒而战果不显赫,则前此的战果能否守住,也就不无问题了。

董就雄 律赋和八股文是您研究古典文学的另外两个范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您便写过《律赋与八股文》的文章。

邝健行 《律赋与八股文》是我在1990年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国际赋学研讨会”时提交的文章。我写这样的题材,原因大抵这样:第一,当时讲辞赋,大家都集中在汉代,或者下涉魏晋。名家既多,要避免自己的作品相形见绌,只好另写别样范畴,容易藏拙。第二,过去一段相当长时期,有一种意识或见解,不管怎样,对固有的某些文类文体,多加负面批评,主张不去理会研究。在砍砍削削的风气潮流之下,足供学术研究的文类文体日益稀少,直至到了所余无几的地步。律赋和八股文基本上属于砍削之列的,因为两者都过分讲究形式技巧,同时又是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文学价值偏低,不足注意。我身处海外,比较随便;为了参加会议,便拿律赋及八股文写文章了。当时学术研究活泼风气已经开始,大会接纳了我的论文。

董就雄 去除参加会议的因素,从学术层面看,律赋值得研究吗?

邝健行 毋庸置疑,这值得研究。最近二十年来,研究律赋的文章或专书纷出,已经说明问题。我想谈几点个人意见:(一)律赋现存的篇章数目,占中国历代赋篇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在一次赋学研讨会上,听马积高先生说的。我们要讲赋,有什么理由舍弃这百分之八十的作品不讲,这样中国赋史还能写出来吗?(二)过去人们多讲汉赋,其次是汉魏六朝赋,但唐及以后的律赋讲得相对地少,园地远远未全开垦,亟须我们后学动锄翻土出力气。(三)律赋虽说是唐代盛唐到北宋中期科举考试

的主要科目,其实它本身的存在,不是百分之百跟科举制度黏附不脱。文人写律赋,也尽有摆脱科举的因素,纯然作为抒情表意的文学作品那样创作,像写律诗一样。(四)律赋本身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即使用于考试,举子能对其独特艺术形式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已是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我认为律赋有研究价值。理清其发展绪脉,论析其艺术技法,了解其体式结构,讨论其影响贡献,凡此之类,都是不宜忽略的。

董就雄 我注意到您无论在个人的进退行径或是学术研究,往往另辟境地,不随波逐流。有关律赋研究,您有什么与人不同的集中点?

邝健行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只写过几篇律赋的论文,没有律赋专书,论文谈的问题也很分散。只因前此律赋的各方各面都少人较为系统的讨论过,而我的文章发表时间较早,所以所谈各点,你说是新境地,是前人所未全道,都可以。如果一定要从拙文中提出一点什么要说的,我愿意谈谈律赋体式,也就是律赋定义。这番意思,在若干篇拙文中或隐或显贯串着。

拙文《唐代律赋与律》及《律赋论体》阐述了个人意见。律赋之名,虽说到唐末五代才有,而后再世称为律赋之所以为律赋的意念,唐人心中应该存有。律赋以“律”为名,可以先考虑唐人对“律”的看法。唐人说到作品之“律”时,往往跟声音并提,而不是跟对偶或辞藻并提,所谓“声律”、“律调”者是。我再进一步集中分析明清学者论律赋的文字资料,从而提出律赋特点有四:(一)讲究对偶;(二)重视声音谐协,避免病犯;(三)限韵,以八韵为原则;(四)句式以四六为主,包括骈列两句对偶式和隔句四句对偶式。我还指出,四点之中,尤以二、四两点最重要,也是声律或律调的具体呈现。

研究某一种文体或文类,先行搞清该文体或文类的特点,当然是重要的事,我尝试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稍后学者撰文时,也有人肯定鄙见有其合理的地方。不过观点各人不同,学术研究百花齐放,也有不以鄙见为然的。肯定我观点的不要谈,我只想谈不以我的说法为然的观点。

这种观点主要是这样:限韵才是律赋的硬标准,其他偶俪、藻饰之类都是次要的。律赋就是骈

赋。这就是说,律赋基本上是加上限韵一项条件的骈赋。这一见解我是仔细考虑过的,觉得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在这样的规定下,律赋的“律”字没有落脚点。第二,一篇本来有限韵的律赋,写作时人们都知道;后来限韵字失载了,后人对到底原来有没有限韵也不清楚了;这篇赋从后代的标准看,则不能算是律赋了。这恰当吗?第三,骈赋体式 and 律赋实有不同。白居易《赋赋》中提到的赋,指考试律赋言,其特点是“谐四声,祛八病”。南朝的骈赋即使讲四声八病(“八病”一名南朝有没有,暂且不论),也是粗而不精,断不能达到如唐赋中那样的声音谐协,病犯避免的地步。南朝赋篇俱在,尽可拿来察读。再说四六隔句对偶,南朝赋篇用得不多,其上下句、上下联间的平仄黏缀,也不及唐赋用得多、用得准确精审。了解声音之道的人,很容易便能判出骈赋和律赋之别的。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可以一提。三两年,前一位学者写了一部论律赋的专著,他是主张限韵是律赋的根本特征的,书中虽然也谈到声律,好像还不算中的。书末作者有感,成律赋一篇。仔细诵读,句联之间的声调病犯处理,颇有可议。这恐怕跟研究时不太重律以致未能完全掌握有关。

董就雄 您有一本论文集,取名《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您参加第一届赋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叫《律赋与八股文》,可见一开始您便对律赋和八股文同等重视,进行研究。

邝健行 我早在提交赋学研讨会论文之前,便想读点八股文,了解一下八股文的体貌。那个时候学者也许还有点顾忌,不曾涉猎或者研究这方面。我收集或影印过好些八股文文集,像《艾千子先生全稿》和《桐城方氏时文全稿》之类,也找到了一些塾课和路德讲析时文的著作,稍稍研习揣摩。不过现在可以说,我对八股文实在不曾深入,没有写过可取的文章。这主要是我的学术兴趣太泛滥,又是希腊翻译,又是杜甫诗,又是律赋,又是下面会谈及的中韩诗话,甚至连当世流行的武侠小说也不放过。用广东俗语说,叫“瓣数太多”。以我这样才质的人,哪里全面照顾得住?到头来每一瓣只尝了一下,没有仔细咀嚼,味道品不出来,更讲不出来。而对八股文之“尝”更浅。

董就雄 辛亥革命以来,八股文整体基本上给否定了。其实就在前代,学者评论八股文的负面意见已不少。您为什么对这一范畴还有研究兴趣?是不是认为八股文还有价值?

邝健行 我想这么说:八股文在过去一个世纪,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因为它是负面的东西,不理睬、不翻阅、不研究了。这是客观事实。另外,八股文在明清两代,是每个读书人不能摆脱的东西。中举早的,也许可以早些甩脱它;中举晚或始终没有中举的,便得晚些甩脱它或一辈子跟它相依为命。这都是客观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一件即使是绝对要不得的东西,可是在过去的时候跟每个读书人生命十分紧密联系起来;即使是绝对要不得,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是不是置之不理便算?我倾向前面的态度。不妨再想下去:旧时代读书人自童蒙便学习八股文,以后研习不断,这种文体的方方面面,如写作时的思维方式、技巧运用之类,会不会深入骨髓?恐怕会的。而当读书人改写其他文类文体时,原来深入骨髓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他后来写作的其他文体文类?好像清人方苞的古文,当时王若霖指说是“以时文为古文”。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方苞写古文时,会有意无意间以八股文写作方式写出来。研究古文是文学史家的正途,可是碰到“以时文为古文”这句话时,研究古文的人不了解八股文,那会研究出道理来吗?我们其实还可以说下去:从文章的内容或技巧言,八股文当中也有好的。一概贬斥否定,似乎不尽公允。总的说来,我认为八股文有研究价值。最近十来年研究八股文的论著渐渐多起来了,这说明人们对这种文体开始重视。

董就雄 不错,过去一些文学史,常常指出八股文对什么文风或文体造成坏影响。作者作出这样的结论时,显然是他们在了解八股文的基础上才说出的。然则八股文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即此可以证明。

邝健行 讲得对。不过有一点也得注意:有时人们执定了全盘否定八股文的宗旨,只要有需要列举负面因素的地方,便把八股文当作其中一项任意加插进去,也不管实际情形怎样。

董就雄 有没有具体例子?

邝健行 游国恩先生等编的文学史,认为明代“前七子”有一项目标,要冲破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



的统治地位。“前七子”要冲破“三杨”一派诗文靡弱平庸的文风,自是事实。可是“前七子”要冲破八股文的统治地位,他们想冲破什么呢?“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何景明集子中,全没有反对或非议八股文的文字。再说八股文只在科举文体中占统治地位,不在以诗文为主的文坛中占统治地位。“前七子”要改革诗文,跟八股文无关,无所谓“冲破”。八股文在“前七子”时或以后,始终为考试文体,“前七子”既未加非议,也无所谓“冲破”。

### 箕书能错玉,周雅或求珍<sup>③</sup>

#### ——韩国朝鲜时期诗话以及中朝诗歌交流

董就雄 现在域外诗话是热门研究方向,而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什么因缘下,您开始从事韩国诗话的研究?

邝健行 说到研究韩国诗话的因缘,我想说两点。199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校方有一个计划,就是可以资助老师在暑假到外地做学术访问研究。我当时想去日本和韩国,了解两个国家的诗话,于是就拟定好计划书,申请到韩国汉城大学(即今日首尔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在汉城大学访问期间,听说大田市忠南大学赵钟业先生编了《韩国诗话丛编》,于是又到忠南大学拜访赵先生,接着又到了日本,在图书馆复印一部分资料。经过了对两国汉文诗话资料的了解,对韩国诗话产生了兴趣,加上当时研究日本诗话的人好像多些,我之后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韩国诗话而较少关注日本诗话了。另一个因缘是,赵钟业先生稍后在韩国召开诗话学术研讨会,并建议成立东方诗话学会,1996年落实了。我被选为理事。第一届1999年东方诗话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召开,第二届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基于与东方诗话学会的关系,我对这方面就更加关注了。

董就雄 您在2002年主编了《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由中华书局在大陆和香港同步出版,这是韩国诗话整理和研究的领先之作,为中外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引起很好的回响。能介绍一下吗?

邝健行 可以,这年份还应推得更早一些。在

1995年,我转职到浸会大学中文系,向香港大学资助委员会申请了一个研究课题:“韩国历代诗话中论述中国诗歌有关资料的辑录和整理”。课题的重心是尝试把历代韩国人谈论中国诗歌的资料集中起来,初步整理后介绍给学术界。我们利用韩国大田市国立忠南大学赵钟业先生编纂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选辑资料。《丛编》共十七卷(即十七册),全书收著作一百二十九种,其中有十五种有目无书,另当中两种用新韩文写成。此外还有四种是中国人作品,不入韩人论中国诗范围,不在选辑之列。所以可供采用的实有一百零八种,当中也不是每种都讨论到中国诗歌,即使讨论到,也不见得资料必定可用。到了最后,我们实际选用了七十七种著作中的资料,辑录、标点、打印,编成七册,约五十来万字。在我们看来,韩国诗话中论述中国诗歌学术价值较高的相当部分资料,大抵都包括了。以上资料再作筛选,2002年出版成《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韩国李章佑教授几位学者去年安排此书在韩国出版,加上现代韩文转译与注释。

董就雄 在这些诗话资料选辑中,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邝健行 关注的是看看韩国诗话资料中,有哪些对中国诗歌研究是有帮助的。譬如上世纪初佚名的《东诗丛话》,书中对王士禛的评论既多,又极为可取,我们便把资料辑录下来了。

董就雄 看来研究韩国诗话的价值甚大,您能再略举几项吗?

邝健行 我想这些价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论诗的价值。韩国历代不少学者学养丰富,诗学湛深,谈论诗歌问题时,往往能提出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这些见解或者中国学者从未提及,或者即使提及,也在韩人之后,可能又不如韩人的清晰完整。他们独特而可取的见解,对我们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所谓“论诗”,不妨从广义的角度看,可以是总说,可以是注解,可以是辩正,可以是论析,可以是评赏及其他种种。第二方面是辑佚的价值。唐宋及以后,中韩人士交往愈来愈频繁。两国人士在对方的国土长期或短暂居留,为数不少。著作之士客居期间写下的文字,由于种种原因,回国时未必准备全部带回,也未必能全部带回。留在

异域的,从后世本国人看来,便成佚著了。或者即使带回本国,却因本国社会或个人情况的变动,还是全部或部分不传,反而留在异域的完好无缺,于是又成为佚著了。我们整理韩国诗话,诗话只属韩国文籍中一个小范畴,可是我们已经发现为数相当可观的中国人撰著的文字册籍,为中土所未见。散佚在韩国的中国文字册籍,无疑需要辑录整理。从这个层面说,韩国诗话的辑佚价值,便显得重大了。第三方面是校勘的价值。韩国诗话中大量引录中国典籍篇章,文字和中国通行本有时不同。可想而知,这便具有校勘的价值。当然,韩人引录的文字,因为误记或误书,明显错误的不少。不过一部分确实需要仔细比勘,不宜轻率下判断;能起补足说明甚或改正作用的资料,数量也相当可观。

董就雄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您点校的《朝鲜人著作两种:干净衚笔谈、清脾录》,您为什么选此两种作点校?

邝健行 《干净衚笔谈》是一册对话录,编著者为朝鲜人洪大容。成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5)五六月间。洪氏和友人金在行于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在北京和三名由杭州来北京应进士试的举子见面笔谈了六七次。洪氏回朝鲜后,整理谈话纸片,另加追忆,编成此书,全书在十万字上下。如此长篇对话录,较为少见。再则内容多样,谈学问,谈风俗,谈历史,不一而足,而且相当深入。我习惯了希腊书的对话形式,一见中朝间也有同样体裁的书,不觉大感兴趣。至于《清脾录》,则是朝鲜人李德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或稍前写成的诗话。李德懋次年带来中国,给中国文士看。此书后来还被李调元辑入所编丛书《续函海》中。由于两书都跟中朝之间文士交流有关,而考证之后,还看到《清脾录》的成书和传播受到《干净衚笔谈》影响,所以拿来校点,合并出版。

还需要稍作补充:《续函海》中的《清脾录》,篇幅远少于原作,文字也非常不同,显然李调元作过改动。我把中土本《清脾录》一起付印,用意方便学术界集中资料作研究,这也是我点校两书出版的原因。

## 结社生员访,忘年日夕扶<sup>④</sup>——组织诗社

董就雄 我知道您除学术研究外,平时也喜欢

创作古典诗歌,九年前您组织了一个以香港浸会大学为基地的古典诗社“璞社”,能谈谈组织诗社的初衷吗?

邝健行 可以的。认真来说,璞社的成立并不是我先组织的,而是由一批同学主动发起的。2002年上学期,我在浸大中文系开“韵文习作”课,有十五位同学修读。课程完毕后不久,几位修此课的同学来找我,建议组织诗社,定期聚会、创作,我非常欣慰,一口答应了。后来又为诗社取名为“璞”,取意是诸生有美质如璞玉,倘能加以琢磨,定必精光自映。

董就雄 能介绍一下璞社的聚会形式吗?

邝健行 璞社是古典诗社,每月聚会一次,预先为下次设定题目写诗,师友们在限期前将诗稿以电邮寄给璞社秘书,然后在浸会中文系会议室聚会。每次聚会都安排一个主持人,主持人在聚后还要为该次诗课评点。在评点之前,主持人会给诗友一个星期时间修改,主持人就根据诗友寄回的改本点评。点评后的诗课会寄给所有诗社成员,让他们作参考、改进之用。我们还会将诗课定本张贴在中文系的壁报板上。

董就雄 璞社有多少成员?

邝健行 璞社是个松散组织,社员自由来来去去,准确成员没法统计,九年下来,总有一百几十人吧。现在固定下来的有六位老师及资深导师,和十多位年轻成员。可以说,不以利益而聚会写诗,上接古人风雅,能延续九年这么长,已算十分难得了。我们有时也会请到浸大访问的教授来璞社出席及点评诗课,如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教授、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等。

董就雄 我知道九年来,璞社成就斐然,有不少出版物面世,能简介一下吗?

邝健行 九年中,我们每两年会出版一本诗集,名《荆山玉屑》,将诗友和老师两年来的诗课选录出版,现已出版了三编。还印行了将近二十本单行本小册子诗集,都是有主题的,例如《延边集》是几位老师和资深导师到东北延吉开会后写成的诗稿结集。我还选编了一本璞社老师和资深导师点评的诗课集《剖璞浮光集》,因为我觉得老师和导师们的评语十分认真,见解独到,对同学以至有兴趣写

诗的年轻人提升诗艺很有帮助。

董就雄 璞社聚会了九年,按聚会次数而言,已踏入了第一百次聚会,您能对社员的创作水平回顾和展望一下吗?

邝健行 回顾过去,我有两种感觉:第一,璞社创作风气比较开放。我们作为老师,不会将意见强加于人,同学喜欢学李贺,学李白、杜甫,或奇丽、或浪漫、或沉郁,都可以走自己的路。第二,从艺术尺度看,社友们所作的诗,有时也很有特点,未必比其他地方的同龄作者逊色。

董就雄 您说过您是跟随曾克端先生学诗的,能介绍一下他的师承,以及他是怎么教您写诗的吗?

邝健行 好的。曾先生工诗古文辞,年轻时在北京随吴闳生(北江)先生受业,北江先生为清末桐城古文家吴汝纶(挚父)的儿子。曾先生早享名声,钱基博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提到曾先生,他那时还很年轻。他教我们“诗选”课,最强调作诗和改诗。而且他定的题目是传统与现代兼备的,既有传统的《述志》、《春雨》等题目,也会叫我们写《原子弹》、《潜水艇》和《暖水壶》等。曾先生自己论诗虽最推杜甫,但他有个好处,就是让学生有自由,有时同学喜欢写六朝体,他也容许。我年轻时喜欢李贺,曾先生也不加阻止。有一次我写《梅窝纪游》,曾先生说杂用李贺孟郊体,有点样子,拿诗稿给当时的诗家看,颇致推扬。这里还得补充说明:曾先生说杂用李贺孟郊体,其实我误打误撞而成,不是真正对李贺、孟郊诗深探有得而有意融合的。

董就雄 您对写诗有什么主张?

邝健行 我总觉得写诗不要写得太旧,要有生活气息,不要动不动就用“挑灯”、“折柳”、“更漏”等陈腐字眼,要写现代的东西。当然,太新的名词写入古典诗中是否那么和谐,我们还要深入研究,但新词入诗是一个重要路向。正如曾先生曾说过,在清末时,陈三立写诗也用了许多新名词。

董就雄 写诗对学术研究有否影响,有人说写诗会干扰学术研究,您怎么看?

邝健行 应该只有帮助而不会干扰,能写诗的人,对诗体本身的特点像平仄对偶修辞之类,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体会。这样的认识和体会移

用于诗歌研究上,往往能发挥积极作用。譬如要讲一首诗的具体艺术手法,讲者既可运用理性的评论知识,又可结合平日写诗实践后的艺术触觉,更容易讲得到位。当然,不懂写诗不会影响研究,但懂写诗可能多一种研究方向,何乐而不为?

## 寄取人文馆外望,山花红紫海天凉<sup>⑤</sup>

### ——新亚追忆

董就雄 您从希腊回港后到今天种种,上面请教了不少。现在想把时光拉回去,请您谈谈在新亚书院念书的事情。您在1958至1962年,就读新亚书院中文系。据我所知,当时像钱穆、唐君毅等大师级学者都在新亚任教,您上过他们的课没有?当时学校的情况怎样?

邝健行 新亚书院当时规模小,学生也不过四五百人(也许三四百人)左右,然而确是名师云集。你刚才提到钱先生,那时他基本上已不在大学部开课了,只在研究所讲课。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听过他讲的半学年“中国文学史”。二年级时,学校本来已请了台湾第一位博士罗锦堂先生来香港教中国文学史,罗先生因事晚来,钱先生便代了一学期课。至于唐先生,我修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唐先生胖胖身型,边擦汗边写黑板,认真而诚恳讲课的情况,我永远忘不了。

中文系课程中,大一、大二国文由黄华表先生教,诗选和杜诗由曾克端先生教,文字学、声韵学、《文心雕龙》由潘重规先生教。外系课程,我除了选读唐先生的课外,还修过陈伯庄先生的社会学,牟润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经学史。以上几位老师,或是文坛名家,或是学界知名学者。我能聆听他们讲课,机缘不易。

董就雄 这些先生讲课有什么特点?

邝健行 都不能详细说了,就以牟先生、曾先生为例吧。牟先生每次上课总抱着一大堆书到课堂,讲课时翻书把原始资料抄在黑板上,然后排比论析,得出结论。他再三提命我们:写文章要言必有据,要仔细寻绎分析资料文字,往往会推陈出新。至于曾先生,他是诗家文家,和悦不拘谨。他教“诗选”,最重视习作。往往上课之初,便在黑板写下题



目,之后下去学校餐厅饮茶喝咖啡,到两节快结束时,便上来收卷。他这样上课,现在要给学生批评的。当时我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而且曾先生下课以后真的用心给我们批改。大家都觉得他做的改动,就是点铁成金。

董就雄 当时书院的整体风气怎样?

邝健行 毋庸讳言,新亚书院是1949年以后,由大陆南下的教授们创办的大专院校。他们对时局世变,自有看法。就我个人了解,钱、唐诸师和其他人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被忽视了,被抛弃了,要极力提倡恢复,这样中国才能站起来。我当时只是学生,懂不了大道理。不过就是从香港一隅观察,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大受鄙视,心中很不舒服。更有一些人在轻视中国文化之余,一味唯洋是尚,到了像牟宗三先生后来所说的“自贱”地步,心里更是难受。我那时是认同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之说的。我同时也了解,诸师讲中国文化,不是一味抱残守阙、食古不化,而是主张不妨适度吸收他人之长,会通中外,所以他们常说中西文化交流。这种论调,对我影响很大。我写过一首五律,题目是《沙田新亚书院山头望海》,中联四句是:“绰约西家子,晶莹东国珍。春风谁振铎,海峤独传

薪。”⑥写的是诸师倡东西文化交流、海外办学的意思。诗是20世纪70年代写的。这时新亚书院已是香港中文大学成员书院之一,校舍宽广美观了,人文馆面海矗立,然而上面诸位老师或者离校,或者离世,早期的书院精神稍见涣散了。我一时有感,便写下诗篇。

董就雄 真是好诗!多谢邝先生您接受访问。

邝健行 谢谢《文艺研究》的盛情,也谢谢你。

- 
- ① 句出邝健行《戏赠邝健行先生三首》其二,邝健行《光希晚拾稿》,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3页。
  - ② 句出邝健行《读〈荆山玉屑〉二首》其二,邝健行《光希晚拾稿》,第38页。
  - ③ 句出邝健行《韩国东方诗话学术研讨会会期纪事》,邝健行《光希晚拾稿》,第58页。
  - ④ 句出邝健行《璞社雅集五十会三首》其一,邝健行《光希晚拾稿》,第56页。
  - ⑤ 句出邝健行《绝句三首赠新亚中文系应届毕业同学》其一,邝健行《光希晚拾稿》,第11页。
  - ⑥ 朱少璋编《荆山玉屑》,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9页。

责任编辑 山木